

1986-1996

中国流行音乐

纪事

北京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编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0211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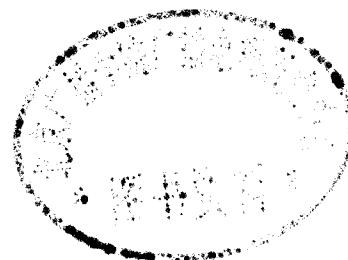
529245

— 1986 - 1996 —

中国流行音乐

纪三录

北京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编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7 北京

编写人员

黄燎原 郭克勤 严翎予 王建国
张 敏 王 薇 王 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年：1986～1996 中国流行音乐纪事 / 黄燎原等编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10
ISBN 7-106-01188-6

I. 十… II. 黄… III. 通俗音乐-概况-中国-1986～1996
IV. J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8742 号

J60927
HLL

十年——1986～1996 中国流行音乐纪事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330000 印数：5000 册

1997 年 1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188-6/J·0602 定价：18.60 元

引言

本书力图叙述的是十年来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历史。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千百年来，音乐与人民大众的生活紧密相连。时光流逝，人类进入了二十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电影、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体的发展与普及，更为流行歌曲的推广流传创造了有利条件。流行音乐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流行乐坛近十年的发展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本书中，流行歌曲的定义非常宽泛，我们认为：凡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歌曲都是流行歌曲或称流行音乐。

新时期的流行音乐开始于“文革”结束后的年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以后，音乐界那些被压抑很久的人们写出、唱出了积压在心底的歌。流行音乐理所当然地成了这恢弘的文化大合唱中的领唱者之一。于是，我们最先听到了著名作曲家施光南谱写的《祝酒歌》和《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前者慷慨激昂，让沉默已久的听众们重新又看到了希望；后者情真意切，唤回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随着这歌声，演唱者李光羲和李谷一的影响遍及大江南北。

很多人将新时期流行音乐的发轫完全归功于港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风行的“校园歌曲”的登陆，及八十年代初简单、上口而富于情趣的美国乡村民谣在中国大陆大、中学校校园内的扩散、传播。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国大陆

流行音乐的本土性——这正是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生命所在，也是十年后中国大陆掀起流行音乐大潮的根基。在 1977 年至 1985 年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歌坛涌现了大量的好歌，虽然当时尚不存在“音乐排行榜”、“唱片销量榜”的具体统计数字和成型的流行音乐市场，但这些歌曲依旧通过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等栏目广泛流传开来。这些歌曲在中国大陆的流行程度和收听率足以让世界上任何一位流行音乐超级巨星或超级乐队艳羡不已。这些歌曲的热心听众是不分年龄的，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大陆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听到有人哼唱这些歌曲。以下列出的是这十年中久唱不衰的部分名曲：《祝酒歌》、《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在希望的田野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军港之夜》、《妹妹找哥泪花流》、《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驼铃》、《乡恋》、《党啊，亲爱的妈妈》、《塞北的雪》、《长江之歌》、《十五的月亮》、《望星空》、《莫愁啊莫愁》、《金梭和银梭》……这些歌的共同特点是贴近现实生活，感人至深，艺术性强，旋律优美，琅琅上口。通过这些歌曲的流行，我们了解到中国流行音乐的根在我们的本土，是我们的人民音乐家们创作了这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传唱、有口皆碑的好歌，劳动者真实的生活才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阳光、空气、水和土壤。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港台歌曲和欧美流行音乐涌入大陆的的确确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审美观念、价值取向、创作手法、演唱技巧及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张行是那个时代最走红的歌手，以翻唱《迟到》、《车站》、《阿西门的渐》广为人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海外的沟通交流愈发频繁。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又听到了久违的另一种声音。邓丽君、崔苔菁、姚苏蓉、黄莺莺、张帝、青山等众多台湾歌星的歌悄然地在一部分青年人中间流行起来。邓丽君在这些“闯入者”中

影响最大，她的代表曲目《小城故事》、《何日君再来》、《奈何》等让歌迷那听惯了革命抒情歌曲的耳朵着实地舒服了一回。

在邓丽君之后，我们又听到了叶佳修、罗大佑的“校园歌曲”。八十年代初，“校园歌曲”在台湾方兴未艾，进入大陆后，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

港台歌曲在之后的几年里，从未停止过涌入大陆的脚步，随着广大歌迷观念的改变，港台歌曲逐渐为他们所接受。众多港台歌星也开始出现在电视台的晚会上。1984年香港歌手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露面，演唱了一曲表达海外游子心声的《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震撼了许多观众的心，也掀起了一股热潮。

新时期十年中，中国流行音乐复活了，广大音乐工作者经过辛勤劳动，获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一部分有责任心的、艺术感觉敏锐的音乐工作者依然看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另一面：长期的思想封闭使中国流行音乐理念保守僵化，创作手段与风格单一，脱离生活，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虽然有成功的作品，但也有不少的作品肤浅平庸。由于音乐制作条件较差，技术落后，宣传与运作更无从谈起。面对现实，艺术家和广大歌迷在企盼、在呼唤：中国流行音乐应该有一番新的面貌，一个新的春天！

目 录

| | |
|---------------------------|-----|
| 引言 | 1 |
| 1986：划时代的年度 | 1 |
| 1987—1988年：东西南北风劲吹 | 7 |
| 1989—1991年：冰与火 | 35 |
| 1992年：多事之秋 | 74 |
| 1993年：签约年·摇滚音乐年 | 107 |
| 1994年：烽火连三月 | 144 |
| 1995年：解约年·自峰巅到谷底 | 176 |
| 1996年：等待 | 234 |
| 中国音乐人名录 | 256 |
| 中国流行乐坛演唱组合名录 | 341 |
| 中国摇滚乐队名录 | 343 |
| 中国部分音乐制作机构简介 | 362 |
| 1986—1996年重要曲目 | 389 |
| 1986—1996年流行音乐大事年表 | 398 |
| 中国摇滚大事记（1980—1996年） | 409 |

1986：划时代的年度

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来说，1986年是个承前启后、跨越了两个时代的年度。在这一年中，中国的音乐工作者们对前十年流行音乐的是非功过进行了总结，而流行音乐界内部的一些变革、举措和事件更对未来的中国流行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些经典曲目在这一年中被创作出来并广为传唱，1986年，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1986年，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和大众传媒对新时期以来十年的流行音乐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三月，由文化部、广电部等单位主持的“全国青年喜爱的歌”评选活动揭晓。《在希望的田野上》、《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牡丹之歌》、《长江之歌》等二十五首作品榜上有名。施光南、谷建芬、王酩、王立平、关牧村、李光曦、李谷一、蒋大为等众多作曲家、词作家、歌唱家获得了奖励。这一活动，充分肯定了这些音乐工作者对新时期通俗文化所做的贡献，对过去十年中广泛流行的经典歌曲进行了总结，激励着更多的青年人投入到流行音乐领域中努力工作。“全国青年喜爱的歌”这一活动名称本身就直接批驳了某些评论者“这样的歌不是流行音乐”的论调，因为这些歌曲的的确确是经过全国青年投票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在新时期开始后的十年中，广大听众、观众几乎每天都能从电台广播或电视中听到、看到这些歌曲的录音或演出。事实说

明了什么样的歌是流行歌曲。

1986年，全国各地召开的大大小小的关于流行音乐的研讨会不下几十个，其目的几乎一致：回顾过去十年流行歌曲的发展历程，研究总结歌曲创作及演唱理论，讨论通俗歌曲的地位与意义，提出了当时中国大陆流行音乐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双重的缺陷，展望中国流行歌曲未来的走向。

在沈阳，《歌曲》编辑部、《音乐生活》杂志社联合主办了“全国歌曲创作研讨会”，此研讨会的与会者回顾了十年间全国歌曲的创作；坦然承认了“中国歌曲创作理论目前尚十分贫乏”，“很多歌曲存在程式化、复杂难解、口号化（重政治宣传而缺乏审美意识）的缺陷”，提出了“对歌曲的审美要求”；肯定了通俗歌曲作为艺术存在的意义。

在上海，中国流行音乐界人士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当前我国流行歌曲存在的三个缺陷：一、多理少情。中国流行音乐受到体制的束缚太深，在音乐概念上过于僵化保守，很难引起听众的共鸣；二、重形轻神。流行歌曲本身和演唱方面存在过多的外在修饰，取代了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三、缺乏动感与生气。中国的流行音乐缺乏阳刚之气，很多创作者与演唱者将‘通俗’错误理解成‘庸俗’，创作不出有气势的大作品，在演唱方面千人一声，千人一形，声音与形象都过于呆板、迟钝，不是不动，而是动得不真实”。

所有这些研讨会，都总结了中国流行音乐已有的成绩，但也反映了中国音乐人对中国流行音乐现实的焦虑与不安。他们在彷徨中寻找着中国流行音乐的突破口，他们渴望走上“真实而又审美”的艺术道路，渴望一种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的出现。

从理论是非曲直的探讨中回到现实的创作实践中来，中国的流行音乐工作者和所有关心热爱流行音乐的人们开始默默地工作。他们中有些人成功了，于是有了后来的辉煌；有些人失败了，

但他们并没有丢弃理想，而是继续向前。所有这些可敬的人们的汗水和泪水都没有白流，正是他们的工作，使中国流行音乐得以向前发展。

1986年，是前进的一年。

1986年6月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北京举行。本次比赛第一次设置了通俗唱法奖项，说明流行音乐开始深入人心。众多的歌手通过参赛一举成名，从默默无闻的演唱者，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电视大赛”——这一通过最普及的传媒宣传流行音乐及演唱者的形式，吸引了无数迷恋流行音乐的青年人跃跃欲试；流行音乐工作者们更加埋头苦干，以期厚积薄发，在中国最高级别的流行音乐赛事上崭露头角，进而在中国流行乐坛占有一席之地。各地电视台、音像出版公司不惜代价培养流行歌手，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模式，举行了数不清的“××杯”歌手大奖赛，推动了流行音乐的普及和发展。今天，当我们回首十年的流行乐坛时，我们会发现众多的歌坛巨星都是从历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开始被歌迷们所认识的。甚至电视大赛现场主持人所说的“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也一度成为电视观众中最流行的话语之一。

6月25日，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比赛结束，获得通俗唱法比赛冠军的是来自沈阳的女歌手苏红，获得亚军的是韦唯，第三名是毛阿敏和王虹。获得业余组通俗唱法冠军的是天津的许丽丽。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前几名获奖者均为女歌手，这充分说明中国流行乐坛一贯的弊病之一：“阴盛阳衰”由来已久。而这些女歌手参赛时的水平的确超越了男歌手。

在后来的十年里，这些在中国流行音乐第一次“顶级赛事”中摘金揽银的女歌星们纷纷地大红大紫起来（除许丽丽外），她们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大型文艺晚会的现场。

三年后，毛阿敏的逃税风波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上了中央电

视台的新闻。九十年代初的几年里，毛阿敏甚至被媒体捧为中国流行乐坛“大姐大”，几年后，韦唯与李谷一的官司打得更热闹，此官司开了中国文艺界人士与新闻界对簿公堂的先河。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韦唯成为奥运百年艺术节上举行个人演唱会的唯一亚洲艺术家。王虹于1988年赴港，成为大陆歌手赴港发展第一人。

电视歌手大奖赛暂告一段落，更多的歌手、作者们又盼着下一届大赛了。

国内的歌唱大赛如火如荼，尽人皆知，而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北京青年在国际音乐比赛上取得的成绩却鲜为人知。常宽，当时还是个中学生，作为中国歌手的代表参加了’86东京第十六届世界音乐比赛。由于十年前我们的流行音乐的水平还很低，在比赛的复赛阶段，常宽就被淘汰了。但是他的一曲《奔向爱的怀抱》给各国流行音乐大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称常宽为“流行乐的天才少年”。最终，大赛评委们将一个特别奖项“总指挥奖”授予了中国歌手常宽。这是中国歌手在国际流行音乐赛事上获得的第一个奖项。在同年于东京举行的另一项国际流行音乐比赛YAMAHA国际流行音乐节上，广东女歌手刘欣茹携广东音乐人解承强的作品《祈求》代表中国参赛，作品获得了词曲奖。

当时还有一个流行音乐的天才少年，他就是郭峰。他毕业于四川艺校，后到北京发展。他的作品《让我再看你一眼》等在城市青年中间十分流行。

1985年1月，美国45位著名摇滚歌星在美国洛杉矶A&M公司举行义演，为非洲灾民筹集募捐款，他们演唱的《四海一心》(We Are The World)通过卫星向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况转播。虽然中国的乐迷和音乐工作者没能看到演出转播，但还是很快就听到了这首震撼人心的歌。

1986年是联合国国际和平年。中国流行音乐界的人士从《四

海一心》这首歌获得了启发，有人开始四处奔走，要策划一场流行音乐会，向“国际和平年”献礼，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流行音乐的风采。

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的编辑吴海岗和东方歌舞团录音公司的经理王彦军是这次音乐会的策划、组织者，并得到了北京电视台的协助。词作家陈哲和作曲家郭峰等人创作了大型组歌《让世界充满爱》作为演唱会主题歌。组织者联系召集了活跃在全国各地舞台上的流行音乐歌星共128名。一切工作就绪后，录音开始。在离正式演出短短的三、四天之内，他们才确定在首都体育馆举办这场演出，当时的舞台条件可想而知。

1986年5月9日，第一届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百名歌星演唱会真正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百名歌星演唱会第一次集中展示了中国流行乐坛的整体实力，几乎当时有影响的青年歌星全部参加了演唱会。其中包括成方圆、孙国庆、胡月、张蔷、常宽、付笛声、屠洪纲、安冬、韦唯……

对于中国的摇滚音乐史来说，1986年5月9日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那天，被人称为“中国摇滚乐的先行者”的崔健作为“独唱演员”第一次走到了众人面前。敏感的记者对于当时的场面有如下记述：“全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崔健和他的伙伴王迪、刘元从后台走向前台时，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也无法预知自己的心声能否被人们理解。”当时“崔健身着一件普通的褂子，两条裤腿一长一短”，与众多歌星们流光溢彩的华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曲目是《一无所有》。当崔健发出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声呐喊：“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之时，那些最初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年轻观众的确是被震惊了。崔健听到了年轻歌迷们的回应，他为中国的流行音乐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摇滚乐。

在1986年到1989年的四年里，中国唱片总公司连续推出了4张《四十首民歌联唱》专辑，总销量超过了四百万盒。“民歌联

唱”在音像市场上的走红，是中国大陆流行乐坛的一个传统现象。这种音乐形式走红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歌迷对充斥音带市场的“口水歌”早已厌倦，将欣赏趣味移向本民族的文化产品；二、大陆新的流行音乐作品水平尚无法满足广大歌迷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三、《四十首民歌联唱》采用了联唱形式，撷取了每首歌的精华部分，配以流行音乐编曲形式，使人耳目一新，大有“老树开新花”之吸引力；四、从 1986 年开始，在中国文化界出现民族传统文化回归的倾向，广大歌迷的怀旧情绪、寻根情绪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传统的音乐必然受到普遍欢迎。这种大趋势也预示着 1987、1988 年一场新的风潮的兴起。

1987——1988年： 东西南北风劲吹

从1987年开始到1989年初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大陆流行乐坛最具影响力的事件莫过于“西北风”的兴起与繁荣了。在这股风的带动下，流行乐坛上又出现过短暂的“东北风”、“中原风”等以中国传统民歌旋律为基本音乐语素的音乐潮流。在这两年间，广东歌坛的实力也开始令人瞩目，“东南风”悄然刮起。尽管如此，港台歌曲涌入大陆的势头并未减弱，因此，大陆流行乐坛逐步呈多元化发展，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使得众多歌迷难以辨别“风”到底往哪个方向吹。

“西北风”这一说法最先出现于1987年，带有西北民歌风格的流行歌曲蔚然成风。“西北风”类型的流行歌曲的总体特点是一反当时流行歌曲的特色，以陕西、甘肃等地的民歌素材为基本音乐语素，旋律昂扬，演唱风格刚劲豪迈，歌词具有深刻的反思、回归情绪及现实批判意味，以民间的审美情趣重新体味处于剧烈变革中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例如“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年又一年……天上星星一点点/陪我到永远。”（《信天游》）和“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周围……”（《我热恋的故乡》）以及“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黄土高坡》）等歌词都极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尚不富裕的生

活现实和在文化层面上对现实的反思、对传统的回归。

有趣的是，“西北风”的代表作品其中有的并非产生于中国西北歌坛，而是产生于受港台歌曲影响最深的广东歌坛。在“西北风”形成后走向兴盛的过程中，更多的代表作品产生于北京等地，而真正出于西北音乐人之手的“西北风”歌曲却十分少见。

1986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制作人郑小莲为女歌手王斯制作专辑，专门请著名的“新空气”音乐组合“三剑客”之一的解承强为王斯写歌。于是就有了刘志文作词、解承强作曲的《寻觅——信天游》。王斯在东北演出时，首唱了这首歌，反响热烈。后来，音乐人侯德建为了给当红女歌星程琳制作第三张新专辑《程琳·87新歌》四处选歌。当他看到这首《信天游》时，不禁为之拍案，于是立即选中了解承强的这首作品。“新空气”音乐组合“三剑客”——解承强、张全复、毕晓世全参与了《程琳·87新歌》专辑的制作。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程琳的一曲《信天游》赢得了满堂喝彩。从此，《信天游》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西北风”也吹了起来。《程琳·87新歌》中，张全复写的《背影》、毕晓世的《从前有座山》亦不同凡响，令人耳目一新。

在接下来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西北风”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中国大陆流行歌坛的主要现象之一。众多音乐人和歌手推出了大量的西北风格的歌曲，这些歌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晚会上、合辑音带中和大大小小“走穴”演出现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包括《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张黎词、徐沛东曲、范琳琳演唱）、《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张静林演唱）、《心愿》（任志萍词、伍嘉冀曲）、《我热恋的故乡》（广征词、徐沛东曲、杭天琪演唱）、《磨刀老头》（刘欢词曲、孙国庆演唱）、《山沟沟》（陈小奇词、毕小世曲、那英演唱）、《龙种》（甲丁词、董兴东曲、胡月演唱）、《刮大风》（臧云飞词曲、王迪演唱）、《无名高地》（田震演唱）等。

1987——1988年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几部电视剧的主题

歌和插曲也为“西北风”的壮大推波助澜。其中，以《便衣警察》和《雪城》两部电视剧最为突出。《便衣警察》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由该剧导演林汝为作词，著名作曲家雷振邦之女雷蕾谱曲)、《雪城》主题歌《心中的太阳》、片尾曲《不管你爱不爱我》(由文岐作词、李黎夫谱曲)。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血雨搏激流……”——《少年壮志不言愁》；

“下雪啦，天晴啦，下雪别忘穿棉袄，下雪啦，天晴啦，天晴别忘戴草帽”——《心中的太阳》；

这两首歌的歌词、旋律均不落俗套，颇具诗词的意境，而又朴实无华，对“那十年”(文革)和“这十年”(改革开放)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西北风格的音乐旋律又极具感染力，颇能打动人心，打动流行音乐市场。这几首歌的演唱者均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青年教师刘欢。他凭借自己的歌唱技巧和对作品的理解成功地使这几首西北风格的流行歌曲，一炮打响，并以“业余”歌手的面目出现于中国流行歌坛。

1987—1988年间，中国电影界最令人瞩目的焦点也是“西北风”。在陈凯歌执导的《黄土地》成功之后，先有吴天明导演的《老井》在日本东京电影节上获大奖，又有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轰动国际影坛，获西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电影《黄土地》插曲《女儿歌》(陈凯歌作词，赵季平作曲)完全采用了西北民歌的旋律。《红高粱》中三首纯正的“西北风”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酒神曲》和《颠轿歌》更是一时唱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这三首歌的曲作者也是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他是“西北风”中仅见的西北作曲家，他在“西北风”的形成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西北风”兴盛的过程中，中国大陆的众多传媒功不可没。这些大众传播工具第一次显示了它们对流行音乐市场的整体影响

力。除前面已谈到的电视剧的播放和各种电视晚会外，电台的音乐一时间内“西北风”之声也不绝于耳。在很多报纸的文艺副刊和娱乐杂志上，众多评论家发表了对“西北风”的看法，记者们推出了大量歌星、作者专访，向歌迷介绍“西北风”动向，有几家专业音乐期刊甚至辟出了“西北风歌曲”和“西北民歌”专栏。

关于“西北风”形成及兴盛的文化层面上的原因，当时许多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评析，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音乐天地》1988年第8期杨瑞庆的：

面对西北风歌潮的思考

近几年的歌坛上，出现了《信天游》、《一无所有》这两首热门的西北风格的通俗歌曲；随后，电视剧《雪城》、《便衣警察》主题歌的传唱，最近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又冒出了《黄土高坡》和《喊和唱》这两首西北风歌曲，再加上电影《红高粱》插曲的流行，于是具有西北风格的歌曲就似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水向中国歌坛涌来，并且还有方兴未艾的势头。西北风歌潮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积聚已久的自然爆发，是中国歌坛的良性表现，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值得总结，以利这股西北风歌潮能更健康地发展。

被称为西北风歌潮的歌曲专指近一、二年出现的吸收了陕北黄土音调，具有摇滚，迪斯科节奏特点，风格粗犷，富有山野风味的通俗歌曲，这股歌潮的出现，说明了群众的审美标准已有了新的追求，集中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对阳刚风格的追求。通俗歌曲的热唱在中国歌坛上